

□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

毛泽东与人民文化话语权的 历史实现及其历史影响

黄力之

2007 年 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 VERSO) 写了导言, 说毛泽东的名字“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 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① 齐泽克的话, 高度肯定了后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价值, 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纪念的相遇, 也许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

一、共和国建国前的文化话语权问题

自 1921 年至 1949 年, 以毛泽东为灵魂与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革命, 第一次建立了由底层人民群众掌握控制的国家政权, 著名美籍学者邹谠称之为: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这就等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来, 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 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 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②

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也认为,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农民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 其原因并不是现代经济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而是由于各地

普遍出现了政治混乱, 从而引出了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和掠夺式的‘捐税’……有时农民能够勉强度日, 但在实在无法承受之时, 就会群起暴动、流亡逃荒, 参加军队或落草为寇。20 世纪初期, 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 怨声载道”。

“在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保护伞下, 地方政治最终得以重组, 使得农民拥有历史上所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正如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北方所发生的那样——农民就会暴烈地攻击残余的士绅, 摧毁其阶级和权力地位……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以后的活动和 1949 年的最终胜利, 就是既直接依赖于这种起义的潜能, 又依赖于将自发的农民造反纳入既有的中国农会秩序的阻碍因素”。^③

这些评价都是从政治领域着眼, 挖掘出中国革命的首要价值, 但是, 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而言, 革命的文化价值也不可或缺, 那就是, 中国人民的文化话语权通过革命得以实现, 并且产生了长远的历史影响, 直到今天。

中国固然是一个文明古国, 文化悠久, 但是历来中国人的文化权利, 即文化话语权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说, 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剥削者能够利用社会资源创造并享受文化, 而劳动大众则相对匮乏, 即使有, 也是在较低的层面上进行。毛泽东在 1927 年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 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 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 不是别的, 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

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④1942年又谈到,中国的工农兵大众“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⑤

以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民国时期为例。据1930年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在30642受调查人口中,受教育者计4424人,占14%。其中男子共计4204人,女子共计220人。在这4424人中,入学年数不满1年者占4%,入学1年者占12%,入学2年者占18%,入学3年者占21%,入学4年者占18%。可见入学者皆未能在初级小学毕业,或在初级小学毕业后即不再升学。也就是说,总调查人口中,只有约6%的人超过小学文化程度。^⑥

毛泽东本人1930年5月调查了闽粤赣交界的寻乌县,其文化教育状况是:全县人口中,文盲占60%(注意:农民亦占人口的60%),识字者中识二百字以内的占20%。以至于在县城里,地主子弟还会在自己的名片上打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字样。^⑦

有学者考察,民国时期“当时大部分中等教育学校集中在大城市中,其余的也基本分布在中小城市,农村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中等教育机构。尽管农村孩子也可以到附近城市接受中等教育,但这种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这样做远不如居住在城市者方便并需要投入时间、路费等方面的更多成本。同时,这些数据反过来也提示,农村根本就很少有人有财力接受中等教育,根本‘没有必要’设置中等教育机构”。学者还依据1998年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提供的材料说,“华中地区在1920年代,拥有30亩地的地主,才能供2个子弟就读初等小学;拥有50亩地的地主,才能供1个子弟就读高等小学;拥有200亩地的地主,才能供1个子弟就读初中”。^⑧

无文化话语权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经济、政治、文化呈现着系统的内在联系:首先是,没有经济权、政治权,也就没有文化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这样表述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

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那些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⑨

然后,当被统治者没有文化权时,也就在逐渐丧失个人全面发展的机会的过程中,失却了自己的人的能力,特别是精神活动的的能力。在分工社会的结构中,只具有体力的人,注定会成为被剥削的弱势者,也就不可能获得经济权与政治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发表的书评中批判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时,就提到了卡莱尔的如此观念,“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寻找。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⑩

所谓“吐字清晰”与“哑巴,说话吐字不清晰”之分,就是文化话语权有无之结果,谁拥有文化话语权,谁就能“吐字清晰”,谁就具有“贵人、贤人和智者”的资格,成为统治者;反之亦然。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中,劳动大众必须自认倒霉。小说《红楼梦》中,乡下人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一群贵族面前只能胡编些乡下的段子,吟着“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让贵族们笑得前仰后翻。当她喝了酒,在音乐刺激下手

舞足蹈起来时,连自由民主派的受压迫贵族黛玉也嘲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此一情节指认了“吐字清晰”者即文化话语权的拥有者和统治者,而“哑巴,说话吐字不清晰”者则因为缺乏文化话语权而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阶级统治。

二、毛泽东对人民文化话语权的认识及其历史实践

中国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权缺失状态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面临如此局面: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生于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入这个国家后,必然发生变通,农民成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毛泽东完成了这一理论工作并成功地付诸实践。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用通俗的语言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⑩

但是,中国的农民是没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⑪当年在俄国,就是出于对劳动大众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担忧,贵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不赞成进行革命,他想等待无产阶级文化水平的提高。列宁对此说了“不”。当革命的青涩苹果欲落下来时,布尔什维克接住了果实,然后再进行以提高文化水平为内涵的“文化革命”。可见,欲提高革命力量的素质,必须解决人民大众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必须创建为人民大众所需要并为他们所运用的新文化。

如果说,这样理解尚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话,那就应该进一步提升到道义层次。按照马克思的

意识形态理论,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时代的话语内容模式,必然只表达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公开或隐晦地排斥与妖魔化劳动大众。毛泽东1936年回顾他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时,说自己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⑫

1947年,毛泽东又说“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⑬

毛泽东对于人民大众的利益、意志在旧文化中的缺位,表示了道义上的愤慨。当然,这本身就是人民没有文化话语权的必然结果,当人民无文化资源可用时,也就无法通过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意志。在统治者看来,让人民与文化绝缘,便可以有效地麻痹人民的意志,让人民继续为自己服劳役,“跑龙套”。凡认可这一现实的人,也就泯灭了自己内心的道义立场。

为了实现人民的文化话语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一切手段去提高劳动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一是改造现有的“文化资源”——让它行使人民的文化话语权。

关于提高劳动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方面。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欢呼“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换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⑭

在艰难的中央苏区时期,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鲜明地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化建设思路,这就是“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①6}

《毛泽东自述》中有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段话:(长征之前)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花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①7}

另外,《寻乌调查》称: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①8}

中共在战争背景下对人民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国民政府方面亦有所认识。1934年11月,国民党军攻占中央苏区宁都县后曾进行过社会调查,称共产党“对于教育,似更积极……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为更积极,每家悬挂一识字牌,联合四五家派一识字者,担任教授,各通衢街口,亦是悬有识字牌,其余如文化展览室、书报所、夜校、消灭文盲协会等,到处皆是”。调查者感慨道,此一“办理精神足资仿效”。^{①9}

战争期间尚是如此,革命胜利后当然更不用说了。1950年代初,开展了全国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在1955年的一则批示中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

农业合作化中才能解决,也只有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毛泽东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号召“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甚至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②0}

1964年,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文化素质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这既标志了有史以来中国劳动人民的文化话语权的实现,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文化基础。

关于改造现有的“文化资源”,实质上就是让知识分子行使人民的文化话语权的问题。

201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至少在网络上发生了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一些人对纪念活动进行了很张扬的声讨,以至于有参与纪念的文化名人公开忏悔自己的纪念行为。似乎,毛泽东的这一文献被公认为历史垃圾了。其实,《讲话》之所以这样招人烦,就在于它向知识分子提出了文化的道义要求,用毛泽东1945年的话来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②1}

《讲话》是如何主张让知识分子行使人民的文化话语权的呢?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

什么是文艺问题的中心呢?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有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

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实际上,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也就是坚持“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立场,不愿意,也不屑于用自己的笔去行使人民大众的文化话语权,结果就是在文化中“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还有自我表现。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要求,的确触动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和个性这块奶酪,但奶酪是神圣不可触动的吗?并非如此。当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时,就意味着古代的圣贤已经意识到自我改造之必要了。古代圣人眼中需要经改造而达到的那个东西,除了传统礼教所规定的忠君思想不可取以外,对人民大众的道义同情还是需要继承的。以杜甫而论,无论是“穷年忧黎元”还是“济时肯杀身”,都是这一文化表现。因而,他说自己“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老逐众人行”(《悲秋》),这样,他不能不言众人之志,儒家的道义要求与自身的命运便相一致了,后人称其为“诗圣”,折射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与中国大众的生存之间的必然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首要的主张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不能说与杜甫的“众人”化无关。

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经过社会实践的锻炼,延安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何其芳反思了自己此前的创作“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中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²²

1942年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的大

会上,以出自内心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抓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²³

一种新的文化——述说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的文化诞生了,自延安时期开始产生了许多人民的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在其自觉性上远远超越历史上的人民性文学,而其路径是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旧的文化资源。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看完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写信给作者,表达了他对人民文化话语权实现的异常兴奋之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一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²⁴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这件大事,已经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化史上。

三、毛泽东人民文化话语权思想的历史影响

毛泽东的时代渐行渐远了,世界与中国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是不会变化的。

2013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提法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

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⑤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群众路线,鲜明地延续了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正是在坚持人民本位思想的立场上,毛泽东当年才进行了以人民文化话语权为中心的文化构建。因此也可以说,今天的人们意识到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意志的重要,重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来整顿社会风气,首先是党风,这客观上体现出毛泽东文化话语权思想的巨大历史影响,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时,中共党内发生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这些年来,在所谓“知识经济”、市场交换、承认差别、反对“民粹主义”等现实和思潮的影响下,忽视人民大众、特别是社会拜金主义泛滥,追逐或伪造物质风尚,炫耀“上流社会”的奢侈豪华,败坏社会道德面貌,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存在合法性。

种种外在原因固然可以去寻找,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的思想立场发生了变化,价值观由人民大众转向自我,立场与世界观的改造成为弃之不用的贬义词。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可回避地提出:只有与人民一体化的政党才是先进的政党,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代表人民并为人民服务;不只是对于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对于自诩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依然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

在追求橄榄型社会、催生中产阶级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重视劳动大众的利益与意志呢?这是因为,劳动大众的历史权利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会浮现出来,因为他们是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恩格斯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⑥当

我们看到中国城市中的所有脏活、累活都是由农民工在干时,难道可以认为恩格斯说得不对吗?

是的,在市场竞争机制之下,弱者之弱也许与他自己的能力有关,也许是历史的延续,但是,人不是工具,人有思想、有情感反应,这会影响历史格局。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了另一个美国人韩丁(威廉·辛顿)写的《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书中记述了山西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黄仁宇说:

“书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贫富严重不均时,例如在许多已开发国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前提是穷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胁。但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即张庄——引注)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做,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⑦

黄仁宇深刻地意识到,国民党对人民大众的利益熟视无睹,只忙于恢复自己的统治,而共产党深知另一个道理:人民不需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谁“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剥削和压迫的现存“法治”,打出“群众路线”招牌,所到之处,推翻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给人民以利益,这样,人民用自己的手推车推出了革命的胜利。

历史上,共产党人是通过改造世界观来确立自己的立场的,这一改造会触动内心的龌龊。如果说,在文化中表达人民性其实古已有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张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齐泽克就说“西方对于默默无闻的亚洲民众一旦觉醒

后的前景的恐惧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述的对女性的恐惧一样,如果他们只是抗议自己的命运并允许我们帮助他们(通过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获取权力就绝对不可以。那些总是乐于帮助贫困者和无产者反抗的(前提是,这种反抗是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这一点吗?”²⁸

共产党并不停留于此,共产党确信自己与人民是一体化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去拯救人民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总是不断去反省并克服自己的精英意识,这就是改造世界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²⁹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文革”期间,“改造”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毛泽东本人从未将自己置于改造之外,他在1942年深度回顾了自己的改造: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³⁰

同在这个时候,朱德这样一个职业军人也在文化人面前谈起自己的思想改造,他说: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³¹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1937年访问延安时就感受到“我了解到,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由青少年组成的整个军队,会自愿地同民众生死与共(所有的红军士兵都是不领薪水的义务兵),会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队就会随之而产生。在延安,动植物几乎不能生长,但人类却幸存了下来。在这儿的黄土里,一种靠饥饿和危险而生存的精神力量正在觉醒。中国的青年们起来了,反抗过去一切可怕的弊病和无能。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青年运动,而它久经不衰的活力中,总是包括着女性的热忱”³²。

斯诺1930年代在延安发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以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³³

的确,中国的革命除了改变它应该改变的东西,如制度以外,更重要的是,革命带来了道德的升华,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当然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用崇高的道义性——对人民大众予以同情、关爱,绝对不是什么需要忏悔的事,反之才是需要忏悔的。

即使在欧洲,由于历史的惯性,资产阶级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话语霸权这一现实,他们甚至因此而害怕革命的发生,但是,内心的道义要求会改造人的思想,有道义追求者如托尔斯泰,他总是像哈姆雷特一样苦苦思考人性的状态,他说自己懂得了,一个人除了为自己个人的福利而生活外,还必定应该为别人的福利服务。托尔斯泰在给年轻的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都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③④}

由此,他甚至怀疑现有的艺术也是在维护着社会的罪恶,“在我们四周,人们大批大批地死于力不胜任的劳动和贫穷困苦,而我们却仅仅为了在无聊生活中寻找花样百出的娱乐去危害别人的劳动,剥夺他们必不可少的衣食。因此,我们圈子里的人的良心哪怕只剩下很少的一点也是不可能沉睡的,会使那些在劳动中受苦和死亡的弟兄为我们提供的种种生活便利和乐趣黯然失色。更何况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他倒乐意忘记这一点,可是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精华,那个不辱使命的部分,经常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残酷无情和我们的非法地位。旧的,强硬的辩词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闹一时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词也经不住简单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⑤

具有这样的人民性理念的作家,他的作品具备伟大的品格,这是必然的。而在所有对人民大众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文艺家中,少有人能达到托尔斯泰的境界。

人民有理由盼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净化党,也净化知识界和文艺界。□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②③齐泽克《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

②邹说《20世纪中国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看》第6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1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所谓“社会性盗匪”,斯考切波借助于他人的解释是,“集体的罗宾汉”。毛泽东在井冈山遇到的王佐、袁文才式的人即是。

④⑤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40、39—40、2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⑫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1011、1058页

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第24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⑦⑱《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24、149、22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陆汉文《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第2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30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⑪《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⑬⑰⑳㉑《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18—19、77、241、1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⑭《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5页。

⑮见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43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⑯参阅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变动史》第11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⑰《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5—456页。

⑱何其芳《谈写诗》(1944),《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37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㉑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

㉒《人民日报》1967年5月25日。

㉓《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19日。

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㉕《黄河青山》第317—318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有材料说,在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以后,何其芳当场为之感动,见吴敏著《延安文人研究》,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感谢吴敏赠书。

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㉘㉙《托尔斯泰文集·政论》第309、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